

# 唐蕃关系视野下的杜甫诗歌

王树森 余恕诚

内容提要:玄肃代三朝风波迭起的唐蕃关系,以及杜甫后期沿唐蕃对峙前线流徙跋涉的独特经历,为杜甫超过150首的涉蕃诗提供了素材基础与创作机缘。这些涉蕃诗不仅见证了玄宗后期至代宗朝唐蕃角力的实际,同时也反映了杜甫期盼国家安定、民族和解的良好愿望,而透过这些涉蕃诗,我们还能对杜诗之所以取得极高艺术成就,究竟在何种程度上需要现实为其提供支撑这一问题得出更加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涉蕃诗 唐蕃关系 行踪 态度 风格

《杜甫诗集》中直接涉及唐王朝与吐蕃(今西藏)关系的诗歌,超过150首,占其全集的十分之一强。创作时间从安史乱前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为诗人对国家民族高度关注并形诸诗篇的至为重要之点,其意义无论是在杜诗自身还是整个唐诗中都非同一般。但过去的中国诗歌研究,一向不大采用民族关系的视角。尽管杜诗研究论著数量巨大,其涉蕃诗歌仍很少被置于民族关系视野下加以审视,其内容与意义,仍未得到应有阐发。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厘清杜甫涉蕃诗歌创作背景与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其意义进行论述。

## 杜甫涉蕃诗的创作背景与基本内容

唐与吐蕃自贞观八年(634)始通消息,此后持续了近两个半世纪的交流交往。既建立过“商量和协”(《唐蕃会盟碑》)的舅甥关系,也留下刀兵相见的血泪记忆。而无论战与和,本身都是一种接触,都加强了彼此的了解、联系与认同。杜甫所经历的玄肃代三朝,唐蕃关系风波迭起。玄宗朝双方在河陇及天山南北一线展开的激烈较量,安史乱后吐蕃利用唐边防空虚尽取西北数十州的蚕食行为,代宗广德元年(763)的吐蕃陷京事件以及此后长期的军事对峙,都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重大而丰富的现实素材。另一方面,正如韩愈所谓“(天)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送孟东野序》),由于命运的安排,杜甫后半生,正沿当时最能体现唐蕃关系大势的关陇秦蜀一线跋涉,因此获得了深刻的切身体验,正是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才促成了杜甫大量涉蕃诗的产生。

从天宝中期开始,杜甫的涉蕃诗创作持续了二十年。期间,无论是唐王朝政局、唐蕃关系走向,还是诗人自己的处境、心态,都在不断变化,涉蕃诗创作也随之呈现出带有一定阶段性差异的丰富内容。

旅食京华时期 由于开元年间唐对吐蕃东进的扼制富有成效,大约从张九龄罢相起,一种推行军事冒险的主张逐渐占据上风,应对吐蕃的策略亦由此前的积极防御转为主动

进攻。天宝元年(742)以后,唐大举用兵青海、剑南,收复大量失地,给吐蕃以巨大杀伤。但无节制的连年征战,以及由此而滋生出的诸多简单轻率的政治军事行为,显然为帝国的安定埋伏下重大隐患。当时杜甫旅食京华,对于尚在可控之中的吐蕃问题虽体会未深,但从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观察中,已敏锐感觉到危机的严重。天宝年间的涉蕃诗,主要内容有二:批判唐玄宗的黠武开边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希望寻求一条立功边塞的入仕之路。

诗人批判开边的代表作品,首推《兵车行》。此诗究竟何指?或以为征南诏,或以为攻石堡,又有一种试图调和的“泛咏开边”说<sup>①</sup>。但一则此诗确由一次具体行役而发,不应为“泛咏”,二则无论此次行役为何,全诗主体仍在写征讨吐蕃之害,“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与“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等句都是明证。所以仇注引《杜臆》云:“旧注谓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是也。”<sup>②</sup>应当说是符合作品实际的。

盛唐时代的从军报国之风直到天宝中后期依然非常浓厚,岑参、高适都于此时进入西北边幕,这对杜甫不能没有影响。他说高适“闻君已朱绂,且用慰蹉跎。”(《寄高三十五书记》)于致意之外,也含有羡慕。他曾向哥舒翰投诗干谒。诗云“每惜河湟弃,新兼节制通。……胡人愁逐北,宛马又从东。”(《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赞扬哥舒翰收复河西九曲,保证了东西驿道的畅通。并望其使用自己:“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同样的意思在《赠田九判官梁丘》、《送蔡希鲁都尉赴陇右因寄高十五韵》中,亦有充分体现,如前诗“陈留阮瑀谁争长”下四句,在美田氏荐贤之功同时,亦含希望汲引之意。

一方面反对开边,另一方面却又向往从军。这种矛盾在《前出塞九首》中,有突出表现。组诗虚构了一位士卒的西北从军经历。九首诗所截取的生活片段并不连续,也并未形成一个统一主旨。《杜臆》云:“《出塞》九首,是公借以自书所蕴,读其诗,而思亲之孝,敌气之勇,恤士之仁,制胜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讳穷,豪杰圣贤,兼而有之,诗人乎哉。”已经点出内容的驳杂。其中有暴露军队黑暗,如“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与“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有批判君主的黠武开边,如“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与“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而“丈夫四方志,安能辞固穷”等句,又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功业意识,这反映出杜甫此时对吐蕃问题只是初有认识,对自身去向亦处于矛盾之中。

左拾遗时期,唐肃宗即位灵武以后,为了迅速收复两京,在外交上借兵回纥、结好吐蕃。曾经一度陷入安史叛军之手的杜甫,于“麻鞋见天子”(《述怀》)之后,终于获任左拾遗一职,这段宝贵的高层政治体验使他对朝廷绥抚吐蕃有了新的认识。此期的《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奉送郭中丞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送杨六判官使西蕃》等诗都已表现出清醒的政治眼光。诗人突出提到同谷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銮舆驻凤翔,同谷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镇枹罕陬。”又多次表达对河陇动荡的担忧:“天子忧凉州,严程到须早。……西极柱亦倾,如何正穹昊?”“崆峒地无轴,青海天轩轻。……须存武威郡,为画长久利。”仇注引卢世傕语云:“送三判官

① 莫砺锋:《杜甫评传》,第88~8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仇兆鳌:《杜诗详注》第1卷,第11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按,本文所引王嗣奭《杜臆》,均据仇注本转引,不再重新出注)。

诗 绝有关系 别出机杼。于威弧振敝 制极收京 布嘉惠 藉长计 清流沙 存武威 反复谆托 即愤激林丘 论兵远壑 穆然有无穷之思 与寻常赠送迥别。”这种维护边疆稳定的思想在送郭英义、杨六判官等人诗中亦有清晰表述。

秦州时期 乾元二年(759)秋 杜甫携家西走 先至秦州 再至同谷 最后穿越崎岖蜀道 抵达成都。这段行程 基本上是沿唐蕃军事对峙前线跋涉 等于长时间的边境体验与采访。诗人对唐蕃关系的高度关注及大量涉蕃诗作均出现在此后 与此段经历关系最为密切。秦州、同谷、西川等杜甫所经之地 在当时均具有重要军事意义。

秦州为唐代长安通凉州以西之南线孔道 亦为陇坂西来之第一要塞。安史乱后 吐蕃首先夺取这里 占据近九十年。大中三年(849) 三州七关收复 唐宣宗下制云:“秦州至陇州以来道路 要置堡栅 与秦州应接。”(《收复河湟制》)杜甫逗留此间 肃宗朝廷边事正繁 故能接触各种西行使节 了解唐蕃关系动态。在《秦州杂诗》、《东楼》等诗中 诗人尤为具体地表现了对于吐蕃问题的忧虑:“稠叠多幽事 喧呼阅使星”、“鼓角缘边郡 川原欲夜时。”诗人于此看到唐朝使节西行 看到秦州以西的烽火之警、鼓角之声愈加紧急 感受到吐蕃的威胁。而中原的平叛仍处胶着:“蓟门谁自北 汉将独征西。”诗人不希望看到内忧外患同时出现 然而现实却是“警急烽常报 传闻檄屡飞。”唐蕃之间已少有宁日。

蜀中时期 四川盆地特别是川北松潘草原 自古就是西北民族觊觎的宝地。有唐一代 西川始终是吐蕃东进的重点之一。太宗朝 松赞干布即曾因唐拒婚而攻打松州。高宗咸亨年间 吐蕃尽取吐谷浑故地 自此连年寇扰川北诸州。如此 则以天府之富 不仅要供拟河、陇边防 亦须直接抵御吐蕃。中唐以后 吐蕃联合南诏一同内侵。而唐亦希望通过在蜀积极作为 减轻吐蕃对关中地区的压力。杜甫居蜀五年 能直接感受到强大外患阴影下的蜀地情状 其友高适、严武都曾直接指挥抗击吐蕃 他本人也一度参谋严武幕府。这显然有助于加深他对唐蕃关系特别是西川重要性的认识。杜甫曾有《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东西两川说》二文纵论形势 这对于当时及此后大量涉蕃诗的产生 同样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蜀中时期杜甫的涉蕃诗创作达到高峰。尽管此时诗人生活相对安定 但诗中仍密切关注日益严峻的吐蕃威胁 如作于宝应元年的《入奏行》云:“兵革未息人未苏 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凭陵气欲粗 奚氏检查应时须。……八州刺史思一战 三城守边却可图。此行入奏计未小 密奉圣旨恩宜殊。”即希望朝廷支援以应对吐蕃。“西山白雪三城戍 南浦清江万里桥”(《野望》)、“风起春城暮 高楼鼓角悲”(《绝句》)等诗句 都包含着深沉担忧。

西山失守与吐蕃陷京 是此期杜诗集中反映的两大事件。广德元年七月 吐蕃尽取河陇 西川形势陡然紧张。杜甫作诗云:“雪岭防秋急 绳桥战胜迟。”(《对雨》)即有山雨欲来之气氛。当时高适主持西南防务 如果他能有效阻挡 不仅能保全剑南诸州 也将有效牵制吐蕃进犯京畿 然高适未能完成使命。西山陷落前后 杜甫连作《警急》、《王命》、《征夫》、《西山三首》、《愁坐》、《岁暮》诸诗 有对吐蕃入侵的斥责 有对军民遭难的哀怜 有对“漫山贼营垒”的无奈 更有对主将失职、安边无策的不满。当严武复镇剑南之时 杜甫又作《扬旗》、《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等诗。“三州陷犬戎 但见西岭青。公来练猛士 欲夺天边城。”

(《扬旗》)希望严武能收复失地。严幕期间,诗人见证并参与了严武诸多御蕃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有《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等诗为证。“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八哀诗·严武》)严武镇蜀之功在多年以后仍被诗人高度评价。

广德元年历时半个月的吐蕃陷京,杜甫从问讯到忧念,再到反思总结,前后写了二十多首诗歌。其中有对天子安危的系念,如“蒙尘清路急,御宿且谁供”(《伤春五首》其一);有对帝京遭劫的悲痛,如“胡虏登前殿,王公出御河”(《伤春五首》其四);有对入侵者的警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登楼》)而对造成此次事变的原因,则更有深刻反思与激切批判。

杜甫激烈批评当权者的无能,如云:“将帅蒙恩泽,兵戈有岁年。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有感五首》其一);“敢料安危体,犹多老大臣。岂无嵇绍血,犹足见时和”(《伤春五首》其四)。都是在慨叹朝廷没有奋力之将、直谏之臣。广德元年冬,长安收复。次年春,杜甫作《收京》一诗以纪,主旨仍是反思。“衣冠却扈从,车驾已还宫。……莫令回首地,恸哭起秋风。”即有明显讽刺之意。《杜臆》云:“用一‘却’字,有不满诸臣意。平日谄谀附阿,有变则奔亡坐视。及至收京,却来扈从。而车驾已还宫矣。此辈何益成败之数耶?”又将批判矛头直指代宗本人。《释闷》诗云:“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杜臆》评曰:“此为代宗不诛程元振而作。吐蕃入寇,逼乘舆,毒生民,祸皆起于程元振。所望一时君臣,翻然悔悟。当柳伋疏入,但削官放归,此诗所以有嬖孽全生之叹也。……然则风尘何由清,而太平将何时见乎。”杜甫又说“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群凶”乃指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一个“任”字,既可见当时程元振、鱼朝恩之流的跋扈之状,也暗讽代宗的听之任之。这种放任,其后果只能是:“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行在诸将阙,来朝大将稀。”(《伤春五首》其三)代宗蒙难,诸镇害怕程元振等构陷,多拥兵观望,当时可以倚仗的,只有郭子仪等人。“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伤春五首》其五)杜甫认为若代宗君臣再不引以为戒,则很难实现“时和”。后仆固怀恩的叛乱,验证了诗人的预见。

江湘时期,永泰元年(765)六月,杜甫去蜀出峡,开始新的漂泊。虽然杜甫一如既往忧念国事,但毕竟已入迟暮。流离老病的处境,影响了最后六年的涉蕃诗创作。

“幽蓟已削平,荒徼尚弯弓。”(《赠苏四偁》)杜甫始终未放松对吐蕃威胁的警惕。上句指安史之乱已平,下句则指边疆尚在对峙之中。大历二年(767),吐蕃寇邠、灵州,京师戒严,此事在其《雨》(山雨不作泥)、《伤秋》、《即事》(天畔群山孤草亭)、《虎牙行》、《后苦寒行》等诗中均有涉及。后来吐蕃退去,双方讲和,并再有和亲之议,杜甫又作《柳司马至》、《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诸诗。其忧其喜均与唐蕃关系密切相关。

江湘时期涉蕃诗的另一重点是反思历史。杜甫一生,经历了唐蕃关系的风风雨雨,时移世易,他希望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秋日夔府书怀》诗云:“旧物森犹在,凶徒恶未悛。……奴仆何知礼,恩荣错与权”,即是批判代宗宠任宦官,《黄草》诗云:“莫愁剑阁终堪据,闻道松州已被围。”又在讽刺蜀将徒知割据争斗而不能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大历元年所作之《诸将五首》组诗,以本朝历史上张仁愿等名将,与当朝“诸将”相对比。像“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



翊圣朝”等诗句,都在批判当朝诸将不能安边弭乱,致使胡虏入关、西戎马逼。

江湘时期的涉蕃诗创作,无论针对现实,还是反思历史,往往并不专由吐蕃而发。而是融入对自身命运的嗟叹中,融入对过往岁月的追忆中。像《昼梦》、《暮归》、《往在》、《夔府书怀》、《遣怀》(昔我游宋中)、《秋兴八首》等,均是如此。诗人认为,唐蕃之间的亲疏和战,是既有历史的重要构成,是影响国运的一个因素,而一己之升沉迁转,同样也与唐蕃关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江湘时期的涉蕃诗作往往呈现出独特的网状结构:全局与地方、内政与外交、国家与个人、现实与历史、庙堂与江湖、故土与他乡,失败与胜利、失误与反思……时空交织,经纬互见,大大提升了诗歌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 “舅甥和好应难弃”——杜甫对唐蕃关系的基本态度

在涉蕃诗中,杜甫还表明了他对唐蕃关系的基本态度。即要构建一个稳定持久的舅甥和协关系,反对来自任何一方的破坏行为。

杜甫十分重视唐蕃舅甥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杜甫反对和亲,并以“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即事》)、“和亲计拙,公主漫无归”(《警急》)等诗句为例。但这往往为具体事件而发,并不能代表其一贯意见。实际上,杜甫始终主张维护舅甥和协。他批评天宝年间用兵青海是“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盗贼总退口号·其二》)而当安史乱起,面对吐蕃助顺请求,他也表示赞许。至德中,吐蕃连续遣使和亲,唐王朝派南巨川报命,杜甫在送其随从杨六判官的诗中,即云:“绝域遥怀怒,和亲愿结欢。敕书怜赞普,兵甲望长安。”(《送杨六判官使西蕃》)既肯定了赞普的结欢行为,又希望吐蕃能够早日出兵。乾元二年,杜甫正在秦州,对于吐蕃的侵扰已有察觉,但他仍云“西戎外甥国,何得讫天威?”(《秦州杂诗》十八)并不愿舅甥相争。广德元年,吐蕃已尽取河陇,杜甫还说“西戎甥舅礼,未敢背恩私。”(《对雨》)对这种舅甥关系仍寄以很大期待。尽管面对吐蕃的进犯,杜甫也曾严厉申斥,但他仍希望双方能维持这种舅甥关系。所以当吐蕃永泰元年撤兵并遣使通好之时,杜甫便说:“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近闻》)强调舅甥关系不应被弃。大历二年冬,吐蕃使随唐使薛景仙入请和亲,杜甫说“闻道和亲入,垂名报国余。”(《秋日荆南……三十韵》)认为薛的出使能再兴和亲之议,有利于国。他又有“设备邯郸道,和亲逕些城”(《柳司马至》)之语,说明即便屯兵御敌,仍需进行重建和平的努力。

杜甫反对来自任何一方的破坏行为。安史乱前所作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即对玄宗的黠武开边激烈批判。《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中,杜甫说:“青海无传剑,天山已挂弓。廉颇仍走敌,魏绛已和戎。”希望哥舒翰能维护唐蕃边界业已形成的安宁。高适赴河西幕,杜甫又说:“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由君主而及边将,其追求和平节制的主张,一以贯之。很多年后,诗人回顾这段历史,仍然耿耿于怀。他说:“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时征俊义入,莫虑犬羊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提封》)仇注云此章“直究当时致乱之由,以垂为永戒也。言当此一统天下,万国同心,世事尚可为也,但勿更寻前辙耳。……使当时息兵爱民,焉有天宝之祸哉?故以戒兵加恩终之。此诗反复叮咛,无非鉴已往以告将来。”约

作于大历二年秋之《又上后园山脚》云：“平原独憔悴，农力费耕桑。非关风露凋，曾是戍役伤。于是国用富，足以守边疆。朝廷任猛将，远夺戎虏场。到今事反复，故老泪千行。”也将内郡凋敝归因于天宝开边。次年夏所作之《遣闷》诗云：“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创。”将安史之乱与陇右穷兵对举，可见在杜甫眼中，黠武开边是导致国家长期动荡的重要根源之一。

而吐蕃背弃甥舅大义，杜甫同样表示反对。《西山三首》中，他称吐蕃入侵者为“盗贼”，并将其进犯西山比作“烟尘侵火井，雨雪闭松州。”又说“子弟犹深入，关城未解围。……辩士安边策，元戎决胜威。今朝乌鹊喜，欲报凯歌归。”就是在激励将士用命，击退外敌。他又有《寄董卿嘉荣十韵》，作于广德二年秋。仇注云此诗“首记董卿防秋之地。中叙吐蕃之乱，勉其敌忾也。末结寄怀之意，重为激励也。”<sup>①</sup>特别是“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黄图遭侮辱，月窟可焚烧”四句，激励董氏要以卧薪尝胆的精神，洗雪陷京之耻。杜甫后期，常以“蜂蚕”、“寇盗”、“犬戎”等不乏侮辱性词汇代指入侵者，已包含着明显的文化对立情绪。

“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诗人希望重见和平。但无休止的杀伐征战，让诗人渐入绝望。“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倦夜》）；“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云安九日》）诗人厌倦了战争。“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遣兴三首》其一）这样的争斗既然无所谓胜负，又何妨消弭呢？“安得”二字，道出了诗人的希冀与无奈。

#### 杜甫涉蕃诗的诗史价值与文学意义

杜诗向称诗史，涉蕃诗提供了唐蕃角逐大历史的细节，不仅能补史阙，而且往往比史书记载更加生动可感。《秦中杂诗》屡屡写到使节西行，浦起龙即随诗注云“史无考。”<sup>②</sup>杨伦又评《有感五首》云：“所言皆当时大事要着，足补国史所未逮。”<sup>③</sup>蜀中时期的涉蕃诗，具体刻画了西南军民积极备战的细节，约作于大历四年的《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又写到了当时为抵御外族而在山南一带征集物资，这些都应当看做杜诗“诗史”特质的重要表现。

而作为文学作品，杜甫涉蕃诗不仅突出代表杜诗现实主义风格，且对这一风格的确立、强化与持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蕃征战的现实拓宽了杜甫观察社会的视野。如前所述，早年的杜甫并未太多体验人间苦难。直到创作《兵车行》时，才表明他对社会与国家危机开始有较深思考。以《丽人行》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这两首诗都描写了玄宗与杨贵妃家族的穷奢极欲。但前诗主要是单纯暴露，后诗却由此看出穷奢极欲背后的民不聊生，并由此引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对比。《五百字》在叙完幼子饿卒之后，转写“默思守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澍洞不可掇。”由嗟叹个人不幸转为对失业农民与远戍士卒的忧念。这种向被称誉的“顿挫”之笔，如果没有诗人主动将目光投向广阔社会，没有《兵车行》中他看到的“牵衣顿足拦道哭”的一幕，是难以实现的。

① 《杜诗详注》，第116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385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③ 杨伦：《杜诗镜铨》，第4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杜诗现实主义风格的强化与持续,离不开唐蕃交恶的现实基础。现实主义创作之得以持续,离不开现实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社会事件的影响。杜甫第一次较为集中、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主要围绕安史之乱产生,随着叛乱的平定特别是诗人入蜀后相对安定的生活状态,他与现实已有意无意拉开距离,“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卜居》)而此时出现的西山失守与吐蕃陷京,显然再度激起诗人对于国家与现实的强烈关注。围绕上述事件,杜甫又创作了大量诗歌。所以仇兆鳌云:“公抱忧国之怀,筹时之略,而又洊逢乱离,故在梓阆间有感于朝事边防者,凡见诸诗歌者,多悲凉激壮之语,而各篇精神焕发,气骨风神,并臻其极。”<sup>①</sup>成就杜甫的,既由于他的天才,更离不开所处的时世。

杜甫弃官西行以后诗歌所表现出的苍茫雄浑境界与沉重的悲凉感,很大程度上亦应归因于其对唐蕃争战总体气氛的感受。陇坂以西,本来就与关中有明显的地理差异,更近塞外风光。诗人居留之时,这里又面临吐蕃的直接威胁,“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都表现出一种沉重的不安。不是身处边关,何以能获得如此感受?“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同谷七歌》其一)只有同谷的飒飒边风,才能催动诗人震撼陇右高原的悲歌。诗人僻处西南,又有“莽莽天涯雨,天边独立时。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对雨》)的诗句,从“天涯雨”、“汉旌旗”便能读出,正是唐蕃交恶,让一场自然风雨,因时世之艰而显出沉重压抑,愈至后来,唐蕃之间亲疏恩怨常会笼罩于诗人的创作中。无论是回忆君王、怀念故都,伤悼亲故、自叹衰病,都是如此。作于大历元年的《秋兴八首》,是诗人回忆历史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组诗所表达的“百年世事不胜悲”的巨大哀痛,正由“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所造成。杜甫晚年流离潇湘,未能返回北方,除了老病,接踵而至的吐蕃陷京、仆固怀恩叛乱给北方局势带来的动荡,也是杜不归的重要原因。“南渡桂水阙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暮归》)长期淹留无疑增加了诗人的痛苦,大历三年,诗人第一次于岳阳楼上远眺洞庭湖水,写下了名篇《登岳阳楼》。此时的他已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而未联所谓“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又道出了依然严峻的国家形势。将对于家国天下的关怀打入个人穷愁的慨叹,二者紧密结合,这既是诗人凭轩洒泪之因,也是杜诗后期悲凉风格所以呈现之源。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杜甫最终没有能看到国家安定,但150余首涉蕃诗,既可被看作一部纪录唐蕃关系的诗史,更可从中见出诗人对于家国天下、对于苍生大众、对于中华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的深沉关爱与真挚祈愿,以及杜甫严肃高尚的人生追求、生命态度。所有这些,终于玉成了杜甫诗歌的崇高标格。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11BZW039)的阶段性生活成果之一。

(王树森,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余恕诚,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毛巧晖】

<sup>①</sup>《杜诗详注》第104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